



一个父亲的温度

朱楠

数字,时间,有时是一种焦虑的透明,有时可以指示规律。生命繁盛,每个人却似乎活在了连串密码里。

简单的时间,2019年11月20日,白天。一个父亲离女儿的距离,八点四公里。从上午八点,到下午两点四十分。太阳的道路已从东边走到当顶,开始向西边倾斜。然而,现代化的方便和快捷,女儿疼痛了六小时四十分,父亲才赶到医院。他拿着笔的手,颤抖着,终于签下了“王忠文”三个字。女儿顺利地推进了治疗室。门“咔嚓”关上。

这不是女儿第一次进治疗室。咫尺天涯。白色在墙上徘徊,王忠文在走廊上徘徊。所谓焦虑,是看着无尽的,泛滥的纯白。走廊。白大褂,墙壁。白得真实,也白得空洞。这个朴实和刚强的男人,一直都在马不停蹄,却在等待中,突然感到全身无力,像一个孩子一样,蹲在了墙边。一只手按着胸口,一只手捂着脸。

爱,责任,说起来就是一个字和一个词汇。如果说开来,爱是人间最深层,最持久的情感。责任,除了是一种担当,可派生成各行各业的工种,也可说成避开或推卸。在此,我不是要解释某个字或者词语,仅仅是想复述和记录日常的一种在场。

在看得见的背后,每个人的生命都充满悖论。王忠文有一个女儿,在昆明上大学。2019年11月1日,女儿肚腹绞痛,被送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。检查后确诊为阑尾炎,需立即手术。阑尾炎说起来可能不是什么大病,可是王忠文女儿的手术,却做了五个多小时,随后进入ICU病房五天五夜。由于他的女儿在两天前感觉肚腹疼痛,她到诊所里打止痛剂。三天后,肚腹再

次疼痛难忍,才进入了医院。手术时发现,整个腹腔已被脓液淹没。作为家长,只有焦虑的等待,祈祷和盼望,水都不想喝一口。用王忠文的原话说:“一口饭送进嘴,眼泪就掉在碗里。泪水和饭一起下咽,像机械似的,一大碗饭不知怎么就完了,啥味也不认得!”

漫长的煎熬,终于看见女儿逐渐恢复了健康。事后,他说起女儿还感叹,“我姑娘的命,差点没了。”他虽然说得轻描淡写,声音却带着哽咽。看着他红红的眼眶,我不由得想起崔健有首歌曲,里面有一段歌词:现实像个石头,精神像个蛋,石头虽然坚硬,可蛋才是生命。

女儿出院后,回昭通在家休养。让人意外的是,伤口却发生了感染,住进了市中医院。在11月20日早上,他和妻子去了一趟医院,给女儿吃了早点,就分别去了扶贫点。而这天早上,女儿伤口疼痛,医生检查时要特殊治疗,必须父母签字。女儿打电话给母亲,未通。继续打给父亲,父亲的电话没人接。直到下午,父亲才回电话给女儿。据王忠文说,女儿平时很坚强,接通他的电话却哭着说:“医生要等你们或者我妈签字。我妈妈也去下乡了,一时回不来。都等一上午了,你能不能快点来医院签字啊?”那一刻,他的双眼红了。面对女儿,他不得不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,平静地和女儿说:“今早上我实在忙不过来,我从大村尽快赶过来,你再坚持一会吧。”现实的确是这样,是坚硬的底层,他对女儿说的话,是柔软酝酿的坚硬。

他赶到医院签了字,时间是两点四十分。

如果回到爱与责任。其实,每个人的脚步都是不一样的,朝着既定的路往前走。要分开来说,不同

的,不过是各人的责任不同。记得有种劝说人生的观点,除了生死,其余都是小事。这句话是让人可以质疑的,所有事都是大事。于王忠文而言,女儿的事是小事,扶贫是小事。在脱贫攻坚工作中,每个人都得负责和认真,坚守岗位,是每个人工作的基本要求。王忠文赶到女儿的病床前,刚签下了自己的名字,他的电话响了,是查岗的人见他不岗,打电话追问。这是一根链条,链条上是相互的爱和责任,他们怕他在工作岗位上失职。谁都在各司其职,履行好自己的职责。医生也如此,要救死扶伤,要遵守规章制度。这是纪律,规定。规定是不能乱破坏的,王忠文的女儿手术,病床边,只有女孩的妈妈。奶奶的签字无效。医生只能催促和等待患者的父母。

忠诚,正道。已近五十的王忠文,头发花白,一双熊猫眼,眼眶大,眼眶黑。他喜欢摄影,有发现的眼光,能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角度,拍摄出有着形式和内容上创新的作品。他曾在一个山区乡镇工作过二十六年,调入城区。目前而言,他还有一个身份标签是,扶贫队员。扶贫工作,从上到下都在强调,这是一块“硬骨头”。全国都在奋力完成,迫切地需要进步和总结,决不让人民还处于贫困之中。所以,关乎扶贫,这是重大的使命,谁都得全力以赴,轻伤不下火线。万象都在显示,脱贫时代要大结束,另一个时代要大开始。在扶贫工作上,不得不说,王忠文自驻村以来,带着爱与责任。他是自己的戒尺,严格坚守扶贫驻村工作纪律。集体主义,吃苦耐劳,舍小家顾大家,如果是一个衡量标准,他属于达标或者箭头还可以再往上。用扶贫驻村工作

队长罗荣兵的话说:王忠文是一个舍亲情,忘我工作的人,是脱贫攻坚战场上名副其实的兵。贫困户的事情,他时刻记挂着,想办法让他们走出困境。这无疑是对他的一种爱责任的诠释。

回到生活本身,成人世界是一条河流。虽说不上惊涛骇浪,却可以说浊浪滚滚。一个走过几十年岁月的老男人,在人生和生活的过程中,有过欢乐,痛苦,或者撞得头破血流,受过的伤,结成的疤,已经锻打成了看似完整的坚强。至少在孩子面前,也是装腔作势一声不吭的大人。但是,看着女儿,他突然觉得自己的无力。女儿进了治疗室,再一次的恐惧感占据了他。那时,他很想大哭一场。可他看着医院无尽的白,看着走廊上穿梭的各种人的身影。他找不到一个可以哭泣的地方,只得蹲在墙边,双手紧紧按着自己的胸口,他深埋着情感,欲诉无语,欲哭不敢。

世界虽然很大,却没有一个男人哭泣的角落。我想起波洛克的诗:我们中间许多人,那些年轻的,自由的,英俊的/都在由于没有爱而死/啊,在你辽阔的大地上,给我们荫蔽吧/没有你,我们将怎样生活和哭泣。

在这人世间,健康的人生,理应承担悲剧。在市中医院的走廊上,于王忠文而言,心灵备受慰藉的是,医生从治疗室走了出来,说出的六个字:“治疗效果很好!”此时,他的心很热乎,带着一张微笑的面孔,在谢谢医生的时候,也默默地谢谢幸运。他笑了,他的嘴唇在笑。他的熊眼在笑,笑得灼热,像挂上了两个红灯笼!



电视机变迁记

胡正刚

作为一位出生于1980年代的青年,我对这个世界最初的记忆来自于生养我的村庄。

在记忆的源头,生活单调而简单。人们最普遍的娱乐方式是在吃过晌午饭后聚集到村口,站着或坐着聊天,天黑尽了才回家睡觉。每户人家的境况都差不多,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电灯,生计艰辛,买灯泡时,常常为买30瓦还是45瓦犹豫半天。由于时常停电,电压也起伏不定,时高时低,灯泡烧坏是常事。有如独自在家点灯熬油,还不如到村口闲聊,热闹而欢乐,每个月还能省下几角钱电费。遇到县里的电影放映队到村公所或者小学放电影,全村人都会早早去占位置,放映结束后,人们讨论情节的热情通常会持续半个多月才会淡去。

那时的生活,简单而朴素,甚至笼罩着一层宁静安详的光芒,而这薄光的背后,则是浓厚得化不开的灰暗,穷困而悲凉。

村里几户家底厚实的人家陆续置备电视机后,每天傍晚聚在村口聊天的人逐渐减少,这种敦实、带着14寸屏幕的机器有神奇的魔力,让人趋之若鹜。

父母不再到村口闲聊,也很少去看电视机的人家看电视,他们起早贪黑种田养猪,农闲时就在家用麻线和稻草编织草席售卖——从他们神色中不时流露出的焦急、期盼中,我隐约觉察到他们正在谋划一件大事。两年多后的一天清晨,父母约了七八个亲戚来家里,宣布要进城买电视机。这可是一件大事,大家推举高大健壮、自行车骑得最稳的表哥负责运送,还在一张永久自行车的后架上牢牢绑了两块木板,以承载电视机的重量。出发前,母亲将一叠钱压实,用橡皮筋扎好,装入外衣口袋,请使得一手好针线活的二婶用棉线将

口袋牢牢缝紧。

一切准备妥当,大人们骑上自行车赶往城里,欢快、慎重又略显紧张,如同去接亲。

我和弟弟在家里等待大人们归来,时间过得那么缓慢,我们一次次兴冲冲地跑到村口张望,又一次次失落地回到家里。太阳快落山时,大人们带着一个大大的纸箱回到家里。男人们小心翼翼地拆开纸箱,把一台黑色的电视机取出来,安放在堂屋正中的桌子上,又爬到房顶上架接收器。接收器的主题装置是一组亮闪闪的细铝管,组装好后,如同一副铮亮的大鱼骨架——学名叫作鱼骨天线,它可以接收电视信号,并传输到电视机。女人们忙着淘米煮肉,不时从厨房踱到堂屋,一边用衣襟擦手上的水渍,一边好奇地看男人们组装调试电视机。

热腾腾的饭菜已经上桌,经过一番调试,电视机屏幕上出现了布满雪花点的画面,声音也带着一股刺耳的滋滋声,即便如此,人们也看得津津有味,抢着坐正对着电视机的座位。

这是一台17寸的长虹牌电视机,天气晴朗信号好的时候,可以接收两三个频道,画面及声音也还算清晰;天阴或下雨,信号变得特别差,声音几乎难以辨别。每当这时,一个人守在电视机前,另一个人则会爬上屋顶,慢慢调整天线的高度和方向,一旦画面变得清晰,电视机前的人会对屋顶大喊:“可以了,可以了,看得清了!”这个法子也不是每次都有效,有时忙活半天,依旧没有图像,房顶上的人只好不甘心地下楼。

除了鱼骨天线,电视机后壳上还有另外两根小铁管构成的接收线,平时如钓鱼竿一样收缩起来,需要使用时,就将它展开,有一米

多长。这两根可以伸缩的铁管叫作羊角天线,它们完全展开时,如同电视机长出了两只细长的羊角。由于经常使用,不久后,一只羊角脱落,变成了独角天线,再过了一个多月,仅存的这只角也被掰断了,我们看电视,只好完全依靠房顶上的鱼骨天线。

这台电视机还具备一个新奇的功能,机器左侧有一个插口,插入一盘磁带,就可以变身为一台录音机,没有信号的日子,我们就用它播放歌曲。

碰上雷雨天气,即使田里的活计正忙,父母也会急忙跑回家,检查电视机的电源线和天线是否已断开,如果恰巧碰到我和弟弟此时在看电视,一顿训斥是少不了的。在雷雨时,高出房顶的鱼骨天线从信号接收器变为雷电接收器,电视机最怕雷击,电路板和荧光屏很容易被雷电烧坏。

电视机另外一个常坏的零件是高频头。这台电视机调频频道完全依靠右侧的手拨片,频繁的使用,拨片容易滑丝,造成高频头接触不良,影响画质。解决的办法是在拨片下撑一根长短适中的小竹片,以稳固拨片。待竹片也失去作用,拨片完全失效,连带高频头也损坏后,就只能带去集市上的修理铺维修了。那几年,修理铺的生意非常好,常常需要排队等候。我们没时间去修理电视,把笨重的电视机搬到五六百米外的集市,壮劳力也会累出一身汗。

几年以后,村里联通了闭路电视,电视机能接收的频道达到了六七十个。当时,社会经济已经在发生巨变,我们的乡村也融入到这巨变中,有闯劲的村民纷纷到州府楚雄市或省府昆明务工,搬到钱后,买了彩色电视机带回家,人们称之为“彩电”,如同称呼人的乳名一样亲切。

第一次在邻居的电视机上看到彩色画面,我们的震惊久久无法平息下来,在缓慢的乡村生活里,这是一项重大事件。彩电还有一个便利之处是使用遥控器切换频道和调整声音,躺在沙发上就可以完成操作,轻松惬意。伴随着彩电的普及,影碟机也时兴起来,能在电视机上观看影片,让人欢呼雀跃。

我已经上中学,弟弟也在上小学,对农家而言,一年的学杂费不是小数目,家里没有能力更新换代一台彩色电视机。大人的智慧再次发挥到极致,他们从市面上买回一种半透明的彩色塑料膜,这种膜有三种色彩,上部是红色,中间是蓝色,下端为绿色,把膜贴在黑白电视机屏幕上,画面由上而下被整齐划一地渲染为红、蓝、绿三个色调,虽然有些失真,但也洋溢着生机,让人长久怀念。

每一段过往都是社会史的一部分,时间是最神奇的魔术师,站在当下回溯过往,记忆里所有的苦涩都已经被它在不知不觉间置换成了蜜糖。

到昆明求学和工作后,疲于稻粱谋,返乡的日子一拖再拖,关于故乡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。不久前回家,在储物间整理旧物时,突然看到这台破旧、落满灰尘的电视机,如同一道明亮、锋利如刀刃的阳光突然划破满天阴云,黑夜退隐,万物主动呈现,所有关于它的记忆瞬间复活。

如今,生活越来越便利,电视机的功效、视听体验、丰富的节目,让人眼花缭乱,应接不暇。随着电脑、网络、智能手机和终端设备的普及,更是让娱乐与学习突破了时间、地点的限制。电视机的变迁,如同整个社会的一个横切面,透过它,我们能深刻感受到社会的变化与发展。

那年那月那些事

袁微

小时候家里穷,杀年猪还要上交一半到镇食品站以完成国家分配的任务,剩下的肉已经很少,那肉也就成了人间美味,不到逢年过节是很难尝上一口的。当然也会有例外,要是多年不见的亲戚突然来访,或是家里人帮忙干活,就会偶尔在晚饭桌上见到一碗香喷喷的猪肉,里面夹杂着半的蒜苗或者葱花。

肉还在锅里炒的时候,我和弟弟早端了一碗饭站在灶台边等着,只希望母亲不要把沾在锅底的油铲得太干净。而实际上每当这时候,母亲也会故意留一点油在锅里,让我们哥俩有机会把碗里的饭倒进锅里沾上一些油腥,慰劳一下淡怕了的胃。要是母亲大发慈悲,还允许在饭里放上一小盐,那样的裹锅饭吃起来就更有味道,晚上睡觉还会美滋滋地想一会儿肉,梦里常常把舌头伸出来舔嘴唇。

隔壁张婶家的小女儿英子,就是在与姐姐争抢锅铲的时候,被姐姐用锅铲在头上狠狠地敲了一下,留下指头大的一个疤,直到出嫁时,那里还是没能长出头发。

家里最穷的时候,是可以穷到两分钱一盒的柴都买不起的。那样就意味着一个星期都得到邻居家去包火。当然也可以向邻居借一盒火柴,或者只借几根火柴签,家里有空着的火柴盒,但不管是一盒还是几根,终究是要还的,包火就可以省下两分钱。于是每到做饭的时候,看准家的茅屋冒烟了,就到谁家去包火。

包火是不能包明火的,那样燃得快,还没走到家就已经燃尽了,得找一些干草,包上几个带火星的木炭,包好了就极快地往家赶,到了家里再使劲地吹,干草就可以燃起来。

穷人都很自卑,但穷人也是要面子的。父母亲一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,因此,包火这样的小事他们是不愿意亲自去的,通常都让我和弟弟去。但小孩子也同样知道要面子,于是,我和弟弟也不会总是到同一个邻居家包火,怕人家笑话。

一次,我和弟弟从邻居家包火回来,路过村里的羊圈时不小心漏了一个木炭,羊圈门口堆的都是喂羊的干草,风一吹就燃起来了。等大家赶来把火扑灭,羊圈已经烧了一半,幸亏圈里的羊都逃出去了。我和弟弟没敢承认我们不小心烧了羊圈,害得村长只好带领大伙到山上割了一天的草,把羊圈重新盖起来。

我一直以为,在我认识的所有女人中,母亲是最勤劳的,她几乎不怎么睡觉。每当深夜我一觉醒来,还能听到火房里传来“噼里啪啦”的声音,那是母亲在搓麻绳。第二天我起床的时候,仍见母亲在昏暗的松香灯前搓着麻绳。也就是说在我们家里,母亲总是最后一个睡觉,但却是第一个起床。看着母亲身后的一大网麻绳,让我觉得母亲就像一只蚕,而那一网麻绳,就像母亲吐出来的丝。母亲是靠靠这些“丝”,换来一家人必不可少的盐巴、洗衣粉、脸盆、饭碗,以及我和弟弟身上穿戴的衣服和鞋帽。

那时候没有电,每个街天都要到镇上的供销社打一斤煤油,为了省油,通常只在吃晚饭的时候点一下灯,吃过晚饭,母亲就会催促我和弟弟去睡觉,而她会很快地收了碗,吹灭煤油灯,点上松香灯,独自坐到火房里搓麻绳。

松香灯燃烧的时候散发出一股怪怪的香味,火焰旁边附着一大团黑黑的浓烟,吸进鼻子就会让人呛得难受。擤出来的鼻涕都是黑的。

为了力所能及地帮助母亲,我和弟弟总会在每天上山放牛或是打柴的时候,把松树下的松香都捡回来交给母亲。母亲把这些松香装进一个烂瓷盆,放在火上烤化,然后倒进一个小竹筒(竹筒的中间搭小棍吊一根棉线),冷却后划开竹筒,一叠叠漂亮的松香灯就做成了。母亲就是靠着这些松香灯,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夜晚。

大约三十多岁的时候,母亲的眼里就会经常流眼泪。我想,那一定是松香灯所赐!

街天是我和弟弟最开心的日子,因为母亲赶街回来的时候,或多或少都会给我们带上一好吃的东西,有时是几颗水果糖,有时是一个芭蕉,有时是一小捧花生。要是碰上母亲背到街上的货都卖完了,恰好价钱也不错,母亲就有

可能给我们每人带回一个小饼子,让我们哥俩既可以品尝到饼子的甜美,又可以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幸福。

早早做完母亲吩咐的事情,看看太阳越爬越高,估计母亲就要回来了,便迫不及待地去接街(也许汉语词典里并没有“接街”这个词,那就算是我的发明吧。意思是父母上街快回来的时候,小孩子到路上去接)。开始只是坐在村头的路旁眺望,远远地过来一个女人,以为是母亲,走近了发现不是;再过来一个女人,又以为是母亲了,走近了还不是。如此重复多次,终究未见到母亲的身影,便有些失望,于是继续往前走,见到熟人就问母亲来了没有。

一次,我和弟弟走了很远的路也没接到母亲,眼看天就要黑下来,又像是下雨的样子,心里特别担心母亲,能不能吃上零食已经不重要,只希望母亲快些归来,好不容易见到了母亲,她背到街上的白菜却一点也没卖,别说买零食,连母亲自己也是饿了一天,没吃任何东西。见到我们,母亲眼里噙满泪水,她一手拉着我,一手拉着弟弟,母子三人默默地无语地走回家。

终于有电了,而且还看到了电视,但不是在我家,而是在杨四爷家。

村里的杨四爷从他祖父算起就开始赶马,走南闯北贩卖私盐、茶叶、山货,积攒下了殷实的家产,到了杨四爷这一代,家道中落,杨四爷也不再四处奔波,只是固定地赶着马帮每天为镇里一户姓周的瓦匠驮柴,但在村里仍数杨四爷家最富有。

1988年的春节前,杨四爷花570元买了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,让羡慕不已的小村人从此大大地开了眼界。

那时热播《西游记》,附近几个村的小孩一到天黑就挤到杨四爷家看电视,因为没有那么多凳子,大家就站着看。后来人逐渐增多,家里挤不下了,杨四爷只好把电视机搬到门口,让大家站到院子里看。

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,大家都已看得上了瘾,每晚必至,精明的杨四爷发现电费越来越高,心疼得不得了。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,杨四爷想出了一个怪主意,他要求看电视的小孩每人都要带上一块柴,并让他的小儿子守在院门口,见柴放人,没过多久,杨四爷家院里就堆满了柴,有时候杨四爷不想上山,就直接把家里的柴驮去卖给周瓦匠。

那时不兴自由恋爱,儿女嫁娶靠的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“瞧家”(相当于女方到男方家实地考察)是婚姻成败的关键环节。在媒婆巧舌如簧的游说下,叔叔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漂亮媳妇,女方说好要来“瞧家”,这可急坏了爷爷奶奶,这一关能不能过,直接关系到叔叔的终身大事。爷爷奶奶不敢怠慢,与媒婆一番密谋,终于想好了应对之策。

姑娘如期而至,媒婆先把她带到楼上,如前一溜儿排开的五六个大“甕包”(用竹篾编成的大箩筐),这里面装的都是稻谷,有今年的,有去年的,还有前年的,只要你嫁过来,一年四季都有米吃,这样殷实的人家,你打着灯笼也难找。姑娘也有几分同意,又提出要去看田地,媒婆便领着她往山下一转,看到好田好地,不管是谁家的,都哄她说是叔叔家的。姑娘越看越喜欢,还没回到家里就告诉媒婆说她愿意嫁叔叔家。

媒婆进门以后才发觉上当了,原来那些“甕包”里装的只有上面部分是稻谷,中间铺一层油布,下面都是包谷。但她虽然知道了也不敢告诉娘家人,怕人家说她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跳。碰上娘家来人的时候,媒婆还得悄悄地出去向邻居借米来做饭招待娘家人。

小时候,每到中秋节就眼巴巴地等着月几圆,母亲要准备月饼、花生、瓜子、核桃、糯米粑粑、月亮,献完才能分月饼。

一家人就分一个月饼,每人一小块,尝一口就用红纸包起来,第二天上学的路上才拿出来吃。

小朋友也会互相比较,看谁的月饼大块。最惨的是头天晚上把月饼吃掉的孩子,说分到的月饼有多大只能用手比,比小了觉得没面子,比大了别人不相信,于是就一路争吵,吵急了就会有人说他根本就没买月饼,把他气得脸红脖子粗,恨不得冲过去把乱说话的孩子狠狠地咬一口。